

清代至民国时期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是西南地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书通过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史料的有效利用，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清代至民国时期开发政策、土地垦殖、矿业开采、外来作物的传入、战争与生态环境以及各民族生计方式在生态环境维护中的作用和进入入手，对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马国君
◎ 著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马国君 著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
马国君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 - 7 - 81126 - 503 - 3

I. ①清… II. ①马… III. ①云贵高原 - 人类活动 -
关系 - 生态环境 - 变迁 - 研究 - 清代 ~ 民国 IV. ①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001 号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著 者: 马国君

责任编辑: 廖 波 史达宁

装帧设计: 陈 艺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851) 5981027

地 址: 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区出版大楼 550025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0851) 6742302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6 - 503 - 3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伟大的母亲田桂兰女士

序 一

云贵高原是一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系我国著名的四大高原之一。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及其延伸地带^①。云贵高原东毗鄂、湘两省;西邻青藏高原;南连中南半岛;北接四川盆地,是传统意义上中国西南边疆的主体部分,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必经区域。云贵高原的地质结构复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关键产流区。对发源于该区域的诸多河流而言,云贵高原数千年来一直发挥着生态屏障的作用。因此,探讨云贵高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必须对这一地区战略地位、自然资源状况及其特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云贵高原海拔 1100 ~ 2000 米;地势大体是西北高、东南低,川西地区与滇西山地为自北而南走向。因受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等较大河流的切割,云贵高原的地形较为破碎,地貌以连绵起伏的山地为主。如云南省的山地与高原占总面积的 94%,6% 的土地为大小不一的坝子。贵州省的山地、高原约占总面积的 97%,坝子仅占 3%,而且坝子的面积普遍不大。云贵高原山地的特点,普遍是高低悬殊大、坡度陡、土层薄,因此种植作物的适宜性较单一,土地的宜耕性差。总体来看,云贵高原的土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若开发利用不当,极易引起水土流失,最终引发后果严重的生态灾变。当前云贵高原某些地区出现的土地石漠化与干热河谷灾变,主要就是清代以来因开发模式失当,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速度跟不上,所诱发或造成的生态破坏的恶果。

清代以前,各中原王朝在云贵高原进行程度不等的经营与开发,其进行农耕与矿业开发的范围尚称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云贵高原的广大地区,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大体仍然保留,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相互制衡的格局尚可维持。兼之云贵高原具有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清代以前,这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52 页。

一地区除农业耕作条件较好的坝区及附近地区被开辟为农田,少量矿藏得以开发外,大部分区域仍为人们难以深入和开发的地区。因此,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良好,普遍分布茂密的森林与肥美的草甸,野生动植物的种类较之现今要多很多;珍稀动植物的分布范围亦较现今广阔。

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加强对云贵高原的经营与开发,尤以经营、开发范围的扩大,经营、开发深度的扩展,经营、开发方式的明显改变为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经营与开发,促进了云贵高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增强了对土地、矿藏、林木等资源的获取,同时也使云贵高原对人口的承载力成倍地增加。但也应看到,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人们对云贵高原的经营和开发,获取和承载多于取之有度,破坏与挥霍强于养护和轮休。这一时期与科学相悖的经营开发方式流行,经营无规划及无限制的获取乃至榨取,对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若经营开发未充分考虑资源利用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相互适应的问题,一旦资源利用方式与生态环境不相兼容,便可能会诱发局部地区人地关系的恶化。因此,回顾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经营方式,总结其取得的成效与付出的高昂成本,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为今天的生态恢复及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一书,便是基于上述旨趣而写成的。

马国君博士通过新方法的使用与新史料的发掘,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开发政策、土地垦殖、矿业开采、外来粮食作物的传入、战争与生态环境,以及各民族生计方式在生态环境维护中的作用和改变等内容入手,对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根据不同时期相关政权经营云贵高原具有的特点,他以相关政权对云贵高原的开发模式为线索,将其分为过境开发、羁縻开发、间接开发、直接开发等四个时期。进而对不同时期的开发模式与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认为在前三个时期,中原王朝对云贵高原开发的规模较小,开发的区域主要是在交通沿线、坝区和城镇附近地区,其余地区当时还为外地移民所难以深入。在前三个时期,云贵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酿成生态灾变的情形少见。

有清以降,中央政府加强对云贵高原的经营,并实施相对全面和深入的直接开发,大致按照中原地区传统的资源利用范式,在云贵高原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垦殖与矿业开采。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云贵高原的局部地区也

出现了人地关系恶化的情形。其中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本书还从云贵高原各民族传统的经营方式入手,探讨了各民族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认为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有良好的适应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运用传统的经营方式开发云贵高原,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亦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作者认为,清代以前以云贵高原本地民族为主进行的开发,在施行的范围和开发的规模方面均较有限,不能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经营开发相比,但对云贵高原生态环境的有效维护仍然值得肯定,对相关的经验亦应研究和总结。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共分八章。第一章回顾相关研究的学术史,阐述了本书写作所依据的理论,以及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二章叙述云贵高原的地理特征,清代以前历朝开发云贵高原的三种基本模式,以及对云贵高原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章阐述清朝开发云贵高原的举措,以及在云贵高原大规模发展农业、矿冶业、林木开采、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第四章阐述民国政府开发云贵高原的举措,对其进一步发展农业、矿冶业、轻工业做出评价。这一时期云贵高原的一些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和烟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章阐述云贵高原本地民族进行的适应性开发,以及清代民国时期本地民族传统经营方式发生的改变。第六章叙述清代与民国时期,云贵高原地区动物种类、数量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第七章阐述清代和民国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各阶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救治措施。第八章为总结与余论。在系统总结的同时提出联想,指出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马国君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云南大学学习期间,他虚心好问、善于思考、刻苦努力,并能耐得住寂寞,因此受到较为系统的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规范训练。所写作的学位论文,在答辩中得到与会专家一致好评,以全票通过获得博士学位。该书即其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取得博士学位后,马国君又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思想战线》《贵州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使博士论文的内容得以充实,学术水平亦进一步提高。我以欣喜的心情,愿意推介这一历史地理学新著出版。

马国君博士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和研究能力,近年来,还跟随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庭硕教授,以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甬坚教授,以金沙江流域为研究范围,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并取得可喜

的成果。他研究环境史的方法,可说是历史学、生态学、民族学与文献学的有机结合。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马国君博士掌握了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其创新能力也是相当突出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马国君博士以现有的成绩为起点,继续前行,永不止步,未来是无限光明的。

是为序。

方 铁 于云南大学

2012年6月8日

序 二

人类的经济文化开发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乃是一项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开展研究的大课题。因为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能不依托于自然环境,都必须以自然所提供的资源条件或生态条件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自然也因为人的存在而不能不留下其所活动的痕迹,构成了人与自然共存共在的互动性“生境”。人不仅在存在论上与自然宇宙大全的规则、功能与结构有着极为密契的对应关系,而且也在目的论上通过自己的认知、实践和劳作不断地参与自然宇宙大全的流行变化活动。人开垦土地,种植庄稼,饲养牲畜,修造房屋,铺设道路——历数几千年的人类活动——都无不以自然为不可或缺的凭借,都必须获得自然条件的配合,然后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按照人的目的性诉求去最大化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也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存在潜能与生命价值。因此,就人与自然共存共在的“生境”而言,自然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乃是一体两面之事,人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而与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的物候条件或生态条件适相对应,生活世界的各种人类群体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因地制宜的知识系统,形成了符合自然环境特征和民族生存习性的礼俗风尚景观。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就必须审慎地对待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特别重要的是,无论对自然的了解或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知识,都源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劳作或实践;都必须透过历史的淘汰过滤机制来获得持续性的积累;都必然与人类群体的存在方式产生密切的关联;都对人类的活动或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意义。

地方性的知识系统尽管形式多样,但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其所涉及的内容无非两大部分:一是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的挑战所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以其为凭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自然资源,从而满足人们为了生存和

生活而不断发展的需要;再即人们为了调适与自然的关系而产生的一套规约体系,以之为限制始能够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修复或再生,从而确保生存和生活着的人们获得更加长久而永恒的福祉。前者的存在乃是人人熟知的事实,似已不必赘言;后者的存在则每易遭到轻忽,大有必要反复强调。理由是自然资源非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而往往总是短缺有限的,极有可能由蜕变而导致枯竭的。如此则知识体系与规约体系,二者必须合为一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境”,更合理地建构生活世界必不可少的秩序。而秩序则必须植根于历史文化固有的土壤,获得自动自发的认同力量的积极配合,化为有源头活水滋润的健康生命机体,才能成为生活世界恒久性的真实存在。在这一意义脉络下,也可说人的自由乃是透过限制显示出来的自由,必须在规范中十字打开的自由。主体的自由的人不仅可以创造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动自我约束。而大量遗留至今的具有乡规民约性质的资源保护碑刻的存在,都在提示我们人类社会规范知识体系的重要,它不但保护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而且也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的方式维系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如同任何生命存在都是宇宙自然大化流行整体的一部分一样,人类也必须透过发展和完善“生境”的方式来发展和完善自身。即使是人类社会环境的特质,也不能悬隔于自然环境之外,必须做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看到蕴藏在其中的秩序同构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个人非常乐于看到马国君博士的新著《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以广义的云贵高原为研究对象,历述自秦汉以降,不同时期的开发活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于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段尤加注意。涉及的内容则为国家与地方行政力量所施行的边疆开发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名目繁多的土地垦殖与矿业开采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果;外来物种的植入及其所引发的农作物结构的变化;各民族传统经营方式的嬗变及其对生态平衡格局的维护作用等等。要之,举凡一切人的观念与行为,无论直接或间接,只要牵连生态环境变迁,作者均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文本叙事范围,详述其始末原委经过。这不仅是因为清代以迄民国的史料相对较为集中,搜考分析较易着力,更重要的是入清以来各种各样的开发活动日趋频繁,由此而诱发的生态灾变亦显得较为突出。而生态灾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迄今为止仍在困扰现代人类,不能不以反思的态度分析其历史成因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足证该书表面仅着眼于既往的历史,其实却蕴藏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态人类学知识,而且亦可供决策者置于案头参考。

作者探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主要采取了历史学、民族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交叉互用的方法,同时钩稽大量实证材料以求结论的允当可靠,目的无非是还原生态环境变迁的真实历史图景,并从中寻绎出可供现代人借鉴的规律性成因。严格地说,在酿成自然灾害的天、地、人三重结构因素中,无论积极或消极,最值得反思和总结的仍是人自身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人的活动作为一种变量因素,或多或少总会作用于自然。而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进步和繁荣,就在于人总是能因应自然的变化来主动做出文化上的调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将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一切灾变,统统看成是单方面的自然演变的结果,遗忘了人在其中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放弃了本该具有的修正或调整自身行为模式的可能。但人的行为所诱发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往往要透过长时段的视域才能如实呈现。因此无论何形式的生态灾变,表面只是现实的生存困境,其实亦多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必须寻流讨源地进行总结性的反思。于是生态灾变史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史,它同时也是自然人化的变迁史。人既然能将自然人化,形成不同的“民族生境”,也就能在自然的面貌中了解真实的自己,不断开辟出生活的新乐章。而作者的叙事学文本取向,恰好能帮助读者达至此一目的。这显然也是我乐于推荐该书的一大原因。相信用心的读者都能通过作者的提示,获得更好的认知人类合理行为,同时也有益于未来发展的历史知识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考察生态灾变的历史成因外,亦用了不少篇幅介绍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族际制衡格局。稍加发挥,亦可说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交往发展过程中,不但形成了复杂的族际文化互补分布结构,而且也造就了多元的族际生态制衡机制。盖云贵高原生态结构本来就极为复杂多样,设若众多的族类群体均采用单一雷同的劳作和生计方式,便完全有可能引发资源利用方面的冲突性争夺与危机,所以不能不采取与之相反的生存发展路径,因应自然环境固有的多元性生态特征差异,形成丰富多样的资源利用模式或经营生产方式。如此则不仅能够实现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的互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维系族群往来互动方面的和谐,形成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足见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开发经营模式亦应允许差异。而单一化的开发模式总是容易引发灾变,原因就是它忽略了地理环境本身存在的差异,总是以凌驾的姿态强迫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按照齐一化的方式就范于某个民族的生存需求,遗忘了与复杂万千的自然物种对应的民族生存需求也可以是多元或多样的。而要解决今天的生态灾变问题,则不但要尊重民族文化生存发展固有的选择,同

时也要重新寻找和建立互补性的族际生存关系基础。我个人始终相信:着眼于区域社会的建构或人类群体的交往,若要真正取得健康合理、持续长久的文明成就,无论如何都是离不开既包含每一个体又超越每一个体的民族认同群体的有效合作的。

通过长期历史过滤机制的淘汰和积淀,各兄弟民族既绵延了自己颇有个性特征的文化,也积累了大量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性知识。而探讨族群(社会)、地方性知识(技术)和自然生态系统(生境)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乃是现代人类必须时刻关注的一大学术题域。其中作为中介系统的地方性知识,一端联系着作为建构或解构者的主体的人;另一端则关涉客观的有待不断认知的自然,不能不特别小心审慎地加以分析和总结,从而予以准确可靠的解读,促使其重新获得富有生命活力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国君博士书中所举者为例:云贵高原长期存在的刀耕火种历史现象,从来都被汉文化学者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代表了未开发的蒙昧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然而揆诸其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实际,与落差和重力侵蚀作用均相对较大的山地生境比照,则可说刀耕火种恰好能够有效地保护地表植被的覆盖率,避免因翻土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何况刀耕火种乃是混成耕牧经济制度的反映,并非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其所受益者除多物种的混合经济效益外,尚提供了畜牧业所必需的饲料。可见刀耕火种作为地方性知识系统中的一环,也潜藏着合理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要素,既不能用另一文化系统的单一标准来衡量,也不能错将扭曲性的解读当成永恒的结论。

概括言之,认识自然与认识人类乃是一体两面之事,二者不仅构成了人类行动的基础,同时也历史性地成为改造客观与主观两重世界的知识前提。我们当然有必要凭借知识系统丰富而深刻的洞见来改善和提升人类全部生存和生活的条件,但与之相应也必须承担起具有主体独立性的人所应担荷的伦理责任。马国君博士的新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化生态知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从中获得相应的学理与经验的收益。

是为序。

张新民

壬辰年酷暑谨识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

序 三

马国君博士的力作《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讨论的对象和范围说不上广阔,但从中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对生态史研究的方法论足以发挥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习惯于认定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是一自然界的演化过程,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学术界不得不逐步的修订充满偏见的看法,开始承认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变迁可以发挥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于是学术界逐步接受了自然与社会共同影响着生态环境变迁这样一种新的观点。但是自然与社会其间的关系如何,始终是学术界亟待澄清的重大问题。马国君博士的这一著作以充分的史料,明确界定人类历史上能够留下明确记载,并为人类的观察和分析加以证实的生态环境变迁,主要是人类活动导致的产物;自然因素仅仅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而且这样的作用是一种常态,不仅影响着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迁。也规约了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这将意味着生态史研究的对象,关键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变迁,而不是其他。因为只有这样的变迁,才能纳入人类历史研究的范畴去加以探讨。至于纯粹由自然因素导致的生态环境变迁,这是地质学和地质史研究的对象,与传统的史学研究对象不能相提并论。

学术界另一习惯性的研究思路,则是将人类及其所建构的社会视为一个无差别的实体去加以对待,其逻辑后果只能是人口的增殖,资源消耗量的扩大,即所谓的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樵采等,乃是导致生态环境退变的根本因素。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其终极结论只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殖,生态环境的退变将是不可避免的恶性后果。但不仅是现代社会,即令是历史时期,人口规模与社会规模,乃至资源利用的规模,与生态环境的退变,并不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在云贵高原,就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可凭的依据。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并不一定是生态环境最坏的地

区,对此学术界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而马国君博士的这本著作却明确指出不同的生态环境各有其特性,而人类对资源利用方式又可以千差万别,这样的差别又归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大抵而言,只要民族文化与所处的生态环境达到高度的适应,那么超强度的资源利用、快速的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损害生态系统,只要民族文化对所处的生态环境达到高度适应,高强度的资源利用和高效的生态维护就可以两全其美。当前云贵高原的生态灾变绝大多数都是资源利用方式失当的产物。特别是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强制推行内地资源利用方式而导致的产物。这样一来,将人与人类社会视为无差别实体的习惯性研究思路,显然将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然科学工作者在难以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挑战面前,作为一种补救提出了“脆弱生态系统”这一新概念,以便能够解释为何某些生态系统尽管人类利用的强度并不大,利用的时间也不长,生态环境退变却十分明显。此类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十年来,“脆弱生态系统”这一提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接受。而马国君博士的著作却不这样看。该著作注意到云贵高原上目前生态灾变最严重的形式,即干热河谷面积扩大、石漠化、土地沙化、生物物种锐减等灾变形式,尽管发生的区域比较特殊,但这些区域在历史上都是生态环境极为良好的地段。而在云贵高原历史上的各民族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当地生物资源的高强度利用。这些区段的生态系统在历史上并不脆弱,而仅仅是清“改土归流”后,大批汉族移民涌入,特别是建构固定农田和工矿企业后,才表现出脆弱性来。可见脆弱的并不是生态系统,而是资源利用方式的失误。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某些生态系统脆弱,倒不如说相关生态系统的某些环节,在不适当的民族文化和不适当的资源利用方式面前,才表现出脆弱性来。这样的研究结论,在今天具有特殊现实意义。如果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对所谓脆弱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退避三舍,彻底交由自然规律去支配,那这样的国土资源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按照马国君博士这本专著的理解,情况就可以彻底翻过来。只要找到可以与之适应的资源利用办法,再脆弱的生态系统不仅可以高效利用,而且可以精心维护好该生态系统的安全,任何脆弱生态系统都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财富”,而不是“禁区”。就连视无可救药的土地石漠化和干热河谷灾变,只要发掘利用相关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可以获得高效利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探讨,都是立足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去展开的,并密切关注不同民族文化对同一生态系统利用上的差异,及其必然派生的不同生态后果。

这样的研究构想,其实在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中早有提及。斯图尔德将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互动的产物称为“文化生态”,而且认定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分析文化变迁的基本单元。遗憾的是,此前的生态史研究,主要取民族学中的“经典进化理论”,对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疏于深究。马国君博士的这本著作最有价值的创新正在于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引入了中国的生态史研究。从而确认生态史,即人类社会下伴生的生态变迁史。其表现形式是生态问题,但驱动生态变迁的动力却是民族文化。这样一来,生态史自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的生态变迁史并不是纯自然的生态变迁过程,也不是自然加人类社会的含混过程,而是民族文化变迁所派生的生态环境变迁历程。该书研究的范围,虽然仅局限于云贵高原近400年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但该书提出的问题是生态史研究的核心命题,即文化生态的协同变迁才是历史学领域中生态史研究的核心命题,这将意味着生态史研究对象的明晰化。

仅此为序。

杨庭硕 于吉首大学创业园

2012年7月8日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5
序三	9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云贵高原的地理特征和清代以前对云贵高原的开发	25
第一节 云贵高原的自然地理特征	26
第二节 云贵高原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	29
第三节 历史上云贵高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	42
第三章 清朝的开发与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变迁	63
第一节 清朝在云贵高原开发政策的调整	63
第二节 山区与边疆的移民与开发	67
第三节 云贵高原固定农田的开辟与高产农作物的种植	76
第四节 云贵高原的林木买卖与生态环境	93
第五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	99
第六节 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09
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开发与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变迁	113

第一节	民国时期开发云贵高原的决策	113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移民与垦殖	117
第三节	民国时期云贵高原矿业、工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	123
第四节	民国时期云贵高原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态环境	132
第五节	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46
第五章	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适应性开发与传统经营方式的改变	151
第一节	云贵高原各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态分布与传统生计方式	151
第二节	云贵高原的直接开发与传统经营方式的改变	158
第六章	云贵高原动物种类、数量的变化与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172
第一节	动物种类、数量的减少和森林覆盖率的降低	172
第二节	云贵高原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177
第七章	社会各阶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采取的救治措施	194
第一节	统治者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采取的救治措施	194
第二节	有识之士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198
第三节	相关乡规民约与环境保护	202
第八章	总结与余论	209
参考文献		221
致谢		233